

專題分析

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安全困境： 同盟捲入的風險

林泰和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本文嘗試以美日安保體制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發展趨勢為例，說明國際關係理論中同盟困境的實際運用與操作。同盟中的安全困境有兩種：捲入與背棄。當同盟中一方為了維護同盟的穩固，而選擇責任分攤政策時，將會陷入被盟友在危機中捲入的風險。而當為了逃避被捲入的風險，而選擇搭便車的政策時，又會陷入被盟友背棄的危險，因此陷入兩難情況，此即所謂同盟中的安全困境。這種同盟困境與同盟的敵對勢力有連動關係。當一方因責任分攤而造成捲入的風險時，會造成反同盟勢力的集結；而一旦因搭便車因而陷入背棄的危險時，遭背棄的一方反而可以使反同盟勢力化解疑慮，而有與其合作的機會。

本文認為，冷戰結束迄今，日本對美國的同盟政策有走向責任分攤的趨勢，進而使日本在安保同盟體制下，被捲入的危險升高。美日安保體制的發展與變化將同時牽動美、臺、「中」、日四邊戰略互動關係。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可藉以說明日本可能因美國介入臺海衝突，而遭美國捲入危機的情況。此一同盟的強化也將使崛起後的中共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使日「中」關係有逐漸惡化的可能性。

關鍵字：美日安保體制、軍事同盟、同盟困境、臺海飛彈危機

壹、前言

2008 年 6 月在釣魚臺海域發生我國聯合號海釣船遭日艦撞沉事件，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所謂「不惜一戰」的發言風波引發爭議。釣魚臺問題並非本文討論的課題，但這一強硬發言的確可能觸動臺、美、日、「中」4 國的敏感戰略神經，尤其是美國亞太最堅實的戰略佈局－美日安保體系。誠如前美國駐日本大使曼斯菲爾（Mike Mansfield）所言，美日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¹對美國而言，日本是其亞太安全體系最重要的軍事夥伴；對日本來說，美國是日本安全防衛事務最重要的盟邦；對全球而言，美日兩國可藉由同盟關係將觸角由西太平洋，深入印度洋並伸展到中東波斯灣地區。兩國不但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並且除了軍事同盟外，更是分享自由、民主、人權等思想的價值同盟。

二次大戰後，基於蘇聯的威脅，日本與美國建構了美日安保體系。然而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安全情勢出現了與國際政治新現實主義相悖的現象，亦即美日安保體制的擴大及強化。依照新現實主義的說法：軍事同盟的成立是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或威脅，如此，同盟才可能成立及鞏固；若失去共同的敵人或威脅，則同盟趨向瓦解。²

以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理論的角度觀察，美日同盟在 1990 年迄今的發展趨勢，意味著日本在安保體制中做出責任分擔（burden sharing）的決定及方向。雖然日本的防衛政策因此得以擴大其行動的空間，但同時日本也冒著被美國捲入東亞區域衝突的軍事風險；但若日本拒絕積極與美國在軍事關係上的合作，而繼續在安全政策中扮演搭便車（free rider）的角色，則東京將陷入被華府背棄的危險。一言以蔽之，日本陷入了軍事同盟中的安全困境。除此之外，日本在同盟政策中不管是責任分攤或是搭便車的任何選擇，不僅是對同盟關係有直接影響，同

¹ Mike Mansfie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haring Our Destinies,"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2 (1989), p. 3.

²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 166;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 p. 211.

時也可能帶來對中共或任何與美日競爭的東亞勢力相當的衝擊。

國際政治理論中，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同盟理論，在解釋區域安全問題時，不免給人一種較悲觀的論述，這也是一般理想主義者對現實主義的批判。近來有關東亞區域安全的學術著作，漸漸出現企圖在各理論間，尋找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綜合命題。例如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與河原伸夫以自由主義價值與效率的觀點切入美日同盟，指出美日同盟不但可以基於共同威脅，也可基於共同價值如民主、自由等互相結合。除此之外，1993年至1994年的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美日兩國從應付危機效率的觀點，自1996年起重新檢討美日防衛指針。³ 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以正和（positive-sum）與零和（zero-sum）的角度，認為美日同盟可扮演再確認（reassurance role）的積極角色，一來可壓制中共崛起；二來可抑止日本擴張。⁴ 范亞倫（Aaron Friedberg）更指出，戰後因中共崛起，加上日本經濟停滯，形成東亞以美「中」二元的國際體系，使得東亞相對穩定。因此，即使用現實主義的角度觀察，仍是有樂觀的結果。⁵雖然上述關於東亞安全的論述，基本上仍建立在權力平衡的前提之上，但至少提供了一種較不悲觀的論述，說明各個理論皆有優點與限制，理論之間的互相競爭，不應導致互相排擠的結果。

本文主要目的是以同盟困境理論的角度，探討日本於1990年代迄今的軍事同盟政策究竟是走向同盟安全困境中的捲入亦或背棄，以及對於日「中」關係可能帶來的後果。

貳、理論架構及研究途徑

一、安全困境概念在國際政治學理論的發展

1945年日本遭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原子彈的轟炸，開啓了戰爭史

³ Peter Katzenstein and Okawara Nobuo, "Japan,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1/02), pp. 169-172.

⁴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110-111.

⁵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 28.

上的核武新紀元。1949 年夏天，蘇聯原子試爆宣告成功，從此人類進入了冷戰體系中恐怖平衡的時代，東西衝突進入白熱化階段。在此歷史背景之下，赫茲（John Herz）在 1950 年首先創造了「安全困境」的概念，也是同盟困境理論的發展起點。赫茲對「安全困境」描述如下：⁶

「每當無政府狀態社會存在時，即會產生所謂的個人、團體或其領導人的安全困境。群體或個人在此狀態之下，通常必然會關心自身安全，以免遭受其他團體或個人的攻擊、控制，主宰或甚至消滅。為了在此情況下保護自己的安全，他們不得不去追求更多的權力，以設法脫離別人權力的掌握；但如此一來又更增加了對方的不安全感，而使他們做最壞的打算。在此競爭對手的環伺之下，無人能感受到真正的安全，權力的角逐因而產生，而安全及武力集中的惡性循環也因此形成。」

赫茲認為國家在依靠自身力量尋求安全時，總是傾向於增加對手的不安全感，因為大家都把自己的安全措施，解釋成防衛性；而把對方相同措施視為對自己有威脅及敵意的攻擊準備。⁷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稱的「人狼狀態」之下，人類社會充滿了未確定性及不信任感，引發了安全困境的現象。赫茲把這種現象轉換到國際體系，藉以說明國家在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中，為了追求安全但卻經常適得其反，造成更不安全的現象。赫茲雖然為安全困境下了定義，但未進一步詮釋此概念。在他 1950 年的文章中，僅試圖以政治理想主義及政治現實主義來跳出安全困境的泥沼。1978 年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他的經典文章「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中，繼續把安全困境的概念加以發展，同時指出安全困境的性質與兩個因素息息相關：攻擊與防禦的平衡及攻擊與防禦武器的區分。⁸

⁶ 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1950/01), p. 157.

⁷ 轉引自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57.

⁸ 詳閱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86-214.

1980 年代，學者施奈德（Glenn H. Snyder）發展出 3 種在多元國際體系下安全困境的運作模式。⁹施奈德把這 3 種運作模式稱為國際政治的超級賽局（super game），藉此國家的軍事力量得以壯大。這 3 種賽局分別是軍備賽局（armaments game），敵對賽局（adversary game）及同盟賽局（alliance game）。其中在軍備賽局中，最能看清楚安全困境的運作過程，而所謂的敵對賽局則指國家或集團之間軍事、經濟、意識型態、權力等相互激烈競爭的狀態。冷戰美蘇兩強之間的對抗是最明顯的例子。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是第 3 種賽局：**同盟賽局中的安全困境**。

二、軍事同盟中的安全困境－責任分擔、捲入、搭便車、背棄

在介紹同盟中的安全困境之前，先簡單說明軍事同盟的定義與性質。同盟基本上是在現實主義¹⁰或新現實主義¹¹文獻中，國際體系權力均衡理論中被討論。同盟的討論也常出現在關於戰爭原因的研究上，當成權力均衡的工具，因為戰爭通常發生在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不均衡的狀態下。以現實主義的角度，同盟是一種國家軍事力量擴張的手段；它是國際體系中以維護安全為目地的策略結盟。¹²如辛格（David Singer）指出，對同盟結合與解體的分析研究，國際體系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分析層次。¹³到目前為止，同盟理論本身的發展並非很完備，因為同盟的討論通常要兼顧到它所面臨的敵人。¹⁴無可爭辯的，同盟是無政府狀態國家體系中的一種變體，它以國家「自救」（self-help）的原則及措施，尋求國際體系的穩定。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指出，無論國家是否採取

⁹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07), p. 461.

¹⁰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p. 201-217.

¹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 166;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pp. 83-103.

¹²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66.

¹³ Helga Haftendorn ed., *Theorie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Gegenstand und Methoden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1975), p. 195.

¹⁴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84.

結盟政策，同盟絕非一種原則，而是一種便宜的措施。¹⁵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現實主義的先趨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指出，一個共同的敵人是同盟的必要條件。¹⁶換言之，一個共同的安全威脅，使同盟的存在合理化。學者史都華（Douglas Stuart）及陶威廉（William Tow）也指出，「在一個沒有敵人威脅的世界中，同盟的意義完全被剝奪」。¹⁷華茲（Kenneth Waltz）也指出，「同盟是由具有不是全部，但是部分相同利益的國家所組成。其共同利益通常是負面的，亦即對其他國家的恐懼」。¹⁸德國學者穆勒（Harald Müller）在建制理論（regime theory）中否認同盟具有合作的性質，他更指出：¹⁹

「國家的安全完全依賴其本身的自助，對抗威脅及侵略，沒有任何超國家的組織可以幫忙，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雖然在同盟中，可以發現國家間制度上合作的形式；但同盟是一種安全自助下的延伸體。它的目的在於透過和其它國家的結盟，與將敵對的力量取得平衡的效果。同盟雖將合作制度化，但是用來對付第三者，而將對手排除在外；然而真正的建制正是要尋求與對手的合作。」

同盟的安全困境剛好發生在不信任感及不確定感充斥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秩序中。依施奈德的意見，同盟的安全困境可分 2 個階段來討論：即同盟建立前及建立後。²⁰在此和本文有關的是同盟建立後的階段。施奈德認為，此一階段同盟有兩種缺點，這也是本文理論探討的核心：背棄（abandonment）及捲入（entrapment）。²¹

¹⁵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201.

¹⁶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3), p. 107.

¹⁷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A US Strategy for the Asia-Pacific: Building a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 System in Asia* (London: IISS Adelphi Papers, 1995), p. 31.

¹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5.

¹⁹ Harald Müller, *Die Chance der Kooperation-Regime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3), p. 122.

²⁰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62.

²¹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66. 依施奈德的看法，背棄與捲入這對概念是由曼德鮑（Michael Mandelbaum）所引進。參閱 Michael

施奈德對背棄及捲入的定義如下：²²

「背棄，一般而言，是一種背叛（defection），但是它有幾種不同的形式：同盟可以轉而與敵方結盟；它也可以解除同盟條約；它可以不履行條約中明顯規定的承諾；或是在同盟出現緊急狀態時，拒絕提供協助。後兩者情況，同盟雖然形式上仍存在，但已名存實亡。捲入的情況是同盟被牽扯進一場衝突當中，但這場衝突對其部分盟邦並無利益，或是無直接利益。捲入的情況通常發生在對整個同盟維繫的價值大於為盟邦利益作戰的成本。在同盟因盟邦的支持，而有恃無恐的對敵方採取強硬姿態時，捲入的情況更容易發生。因此，若盟邦對同盟的依賴越強，對其承諾越多，被捲入的機會越大。」

同盟的安全困境發生在：當盟邦設法避免背棄或捲入兩種困境，而做出責任分擔或搭便車的決定時，它又會陷入背棄或捲入兩種困境之一。

理論上來說，同盟（集體防衛）的建立是基於一種將安全的概念當成公共財的假設。瑞士學者傅瑞（Daniel Frei）如此分析搭便車的策略：「每一個人傾向於享受無論如何都會提供的成果，而此一成果又無法排除其他人的分享，如此，個人將不會自願地為它所享受的成果付出代價，而形成搭便車的策略，除非有人強迫它分攤成本，而做出貢獻及分攤」。²³在盟邦想維持同盟的存在，而做出貢獻時，就陷入了被捲入衝突的危險；但當它要避免被捲入而採取搭便車的政策時，則又會冒著被盟邦背棄的風險。以上就是同盟安全困境的基本要義。

本文所指的搭便車策略是指經由美日同盟的安全架構，使美國負起大部分的安全責任，而使日本得以在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全力發展經濟。而本文中的責任分攤是指當美國不願意在安保體制下，承擔絕大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f. Snyder, p. 466, fn.5.

²²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66-467.

²³ Daniel Frei, *Sicherheit: Grundfragen der Weltpolitik* (Stuttgart: Kohlhammer, 1977), p. 48.

部分安全責任時，日本必須在維持同盟關係的目的下，相對強化其本身的防衛能力與責任。

同盟困境中另外一個問題是談判立場的強弱。依施奈德的意見，若一個盟邦以責任分擔的方式，對其所屬同盟做出巨大貢獻，其談判立場則會惡化；相反的，要取得較強的談判立場，則它不必要全心全力維繫這個同盟。簡單說，對盟邦立場轉變的疑慮與擔憂，使得被動的一方享有談判的優勢。²⁴又依新現實主義觀點，同盟以一種制度性合作方式出現，也無法避免一般合作關係的兩個主要難題：欺騙與相對利益。²⁵

另外一個重要課題是同盟困境與敵對困境的交互影響。責任分擔的戰略會壯大同盟力量，如此，依照權力平衡理論，將會很快的形成一個反同盟的成立。相反之，若採取搭便車的策略，則可降低反同盟形成的危險，進一步減少衝突的可能性。²⁶而此乃屬於同盟外，敵對困境或敵對賽局的範疇。此一原始安全困境與螺旋式衝突升高模式的經典著作，應是傑維斯在 1976 年與 1978 年出版的兩份專論。²⁷

傑維斯強調，在螺旋式衝突升高的模型中，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強迫國家從政者必須提供安全。而當國家追求防衛能力時，他們同時獲得過多與過少：過多是因為這種能力能夠執行侵略行動；過少則是因為其他國家感受到這種威脅而加強軍備，進而減少國家安全。²⁸所以國際政治中，安全困境是理解有相同目標的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何仍然以競爭與戰爭為最後結局的關鍵概念。²⁹在此意義下，日本因戰後和平憲法的規定，而形成以防衛為主的國防政策，加上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也同樣可能出現此種現象。

²⁴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67.

²⁵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 pp. 12-26.

²⁶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86.

²⁷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8-11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01), pp. 167-214.

²⁸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4.

²⁹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10), p. 171.

傑維斯強調當國家從政者認為攻擊能力比防衛能力更能提供高程度的安全時，安全困境到達最嚴重的情況，因為承諾，戰略或科技的進步使得擴張成為通往安全的直接道路。³⁰在此情況下，維持現狀國家必須如侵略者一般行動，不太可能放棄擴張的機會，以換取他國的安全承諾。葛萊瑟（Charles Glaser）同樣認為，如果獲得額外領土能提供緩衝區域以防止侵略，或是為防禦提供額外資源，在此情況下，擴張將成為誘人的選項。而從中共的角度看來，取得臺灣以擴張領土，將可能有同樣的戰略意涵。³¹

在不確定與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潛在敵對雙方的不信任將導致採取預防性與防衛性的措施，而這將再度使敵方認知為攻擊的威脅。此將導致反制措施的執行，降低安全性，使得衝突局勢極度升高，從而製造出自我實現的預言。柯慶生指出，尤其在東亞地區，海上運輸與能源需求將導致不穩定的強權競爭。更重要的是，東亞強權之間在歷史上充滿不信任與敵意。³²而在臺灣問題上，政治與地理的議題使得防衛性的武器或措施，更容易被理解為具有攻擊性與危險性，尤其是中國大陸。

在此必須特別強調，沒有任何單一的國際關係理論能夠完全解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而僅能解釋或看清楚一部份的事實，本文美日安保體制的案例亦同。本文應用基於現實主義發展出的同盟困境理論，解釋美日安保體制，充其量只能解釋一個重要的面向，無法解釋所有的面向。對此議題更深入的探討，有賴於其他理論或研究途徑的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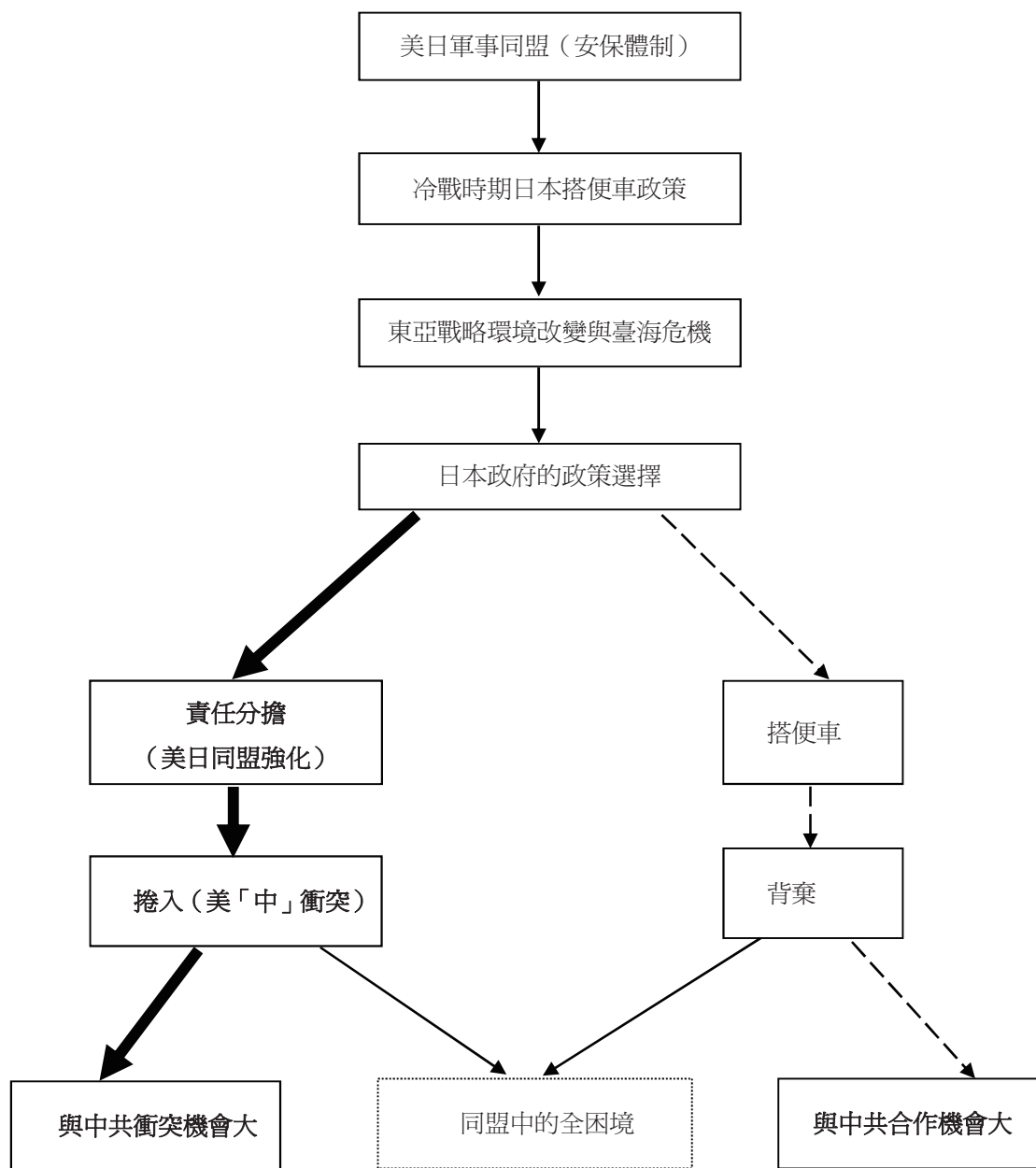
以下將以實證資料探討兩個主要問題：第一，日本在後冷戰時代的同盟策略為何，是責任分擔或搭便車？第二，這種策略對日本及亞太其他強權，尤其是中共的影響為何？隨後的論述將使用以下「軍事同盟的困境模型」做為論證架構。圖 1 為軍事同盟困境的理論模型，以傅瑞的同盟危機定律，套入日本案例加以修正，成為本文論述先後順序的主軸。

³⁰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187.

³¹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1992/07), p. 504.

³² Thomas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 50.

圖 1 同盟困境危機定律模型



粗線表示日本可能的戰略選擇及可能陷入之同盟困境；長虛線表示日本另一種戰略選擇及其結果。資料來源：Daniel Frei, *Sicherheit: Grundfragen der Weltpolitik* (Stuttgart: Kohlhammer, 1977), p. 61（模型經作者修改）。

參、東西衝突下安保體制的同盟困境 - 搭便車與責任分擔

一、冷戰時期日本搭便車戰略

在東西衝突之冷戰架構下，日本常被戲稱為安全政策的搭便車者。冷戰結束後，日本堪稱是最大的贏家，這是日本在冷戰時期安全及外交政策下的最佳寫照。綜觀 1945 年至 1990 年日本安全政策主軸，基本上是沿著美蘇兩超強對峙之下的二元國際體系所發展，也就是施奈德所稱的國際政治的超級博奕。美國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核子保護傘及在當地駐紮傳統武力；經濟上則提供其國內龐大的市場，讓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經濟能在戰後迅速重建，奠定往後經濟快速起飛及壯大的基礎。

整體而言，冷戰之下日本在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成就，實依賴於美日在軍事與安全密切合作下，穩定的國際及區域環境。而日本與美國在軍事與安全方面的合作，最重要的機制就是美日安保體制。楊永明認為，美日安保體制經過冷戰洗禮，成為日本安全政策主軸，因為安保體系能夠維繫吉田主義的精神，使日本可以在安定的國際環境中發展經濟；而安保體系也能提供日本參與區域安全議題的切入點。³³在此國際背景之下，東京無論在軍事、安全或經濟領域，皆是美日安保體制下的最大受益者，此一現象在前述理論上稱為搭便車現象。

1970 年代國際政治上開始起了一些變化。尼克森（Richard Nixon）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整個國際大環境由衝突情勢漸漸進入和解階段。東亞情勢也有非常重大的轉變，這包括越戰後美國軍事力量的撤退及縮減，蘇聯在亞太地區軍力的擴充，以及兩次石油危機。一連串事件使得要求日本責任分擔的聲浪擴大，而使日本政府逐漸強化其安全政策，對國際事務介入的程度也與日俱增。³⁴戰後日本所遵行的吉田主義，其要義為：軍事依賴美國、提供美國軍事基地、加強與美國政經關係的合作、

³³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一九四五～一九九〇〉，《問題與研究》（臺北），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10 月，頁 14。

³⁴ Marshal Zeringue & Daniel Kritenbrink,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Defense Analysis*, Vol. 29, No.2, 1994, p. 117.

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安全困境

全力發展經濟、對國際事務及紛爭採取消極不介入的態度－在這個時候不得不做某種程度的修正。

二、冷戰時期搭便車戰略的調整

日本對安保體制下同盟政策的重大改變可在 1976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制定、《防衛計畫大綱》的通過及綜合政策的擬定等看出整體輪廓。1981 年前日相鈴木赴美國參加美日高峰會議，在發表「美日共同聲明」後的記者會中表示，日本將分擔 1 千浬的海上防衛任務。但 1 千浬明顯超越日本領海範圍，於是引發此海上聯合防衛是否抵觸「專守防衛」之原則，以及憲法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之規定。³⁵1980 年代，前日相中曾根當政時期，終於突破國防預算不超過 GDP 1% 的限制，並重新確定及重申前任首相鈴木在 1981 年向雷根政府做的承諾，亦即日本將負起防衛其周邊 1 千浬重要航道的責任。

總括言之，冷戰時期安保體制下，日本的同盟困境在於：若日本負擔太多安全與防衛責任，將會違反其戰後和平憲法第 9 條有關放棄戰爭的規定及吉田主義精神，此舉也會引起亞洲各國對日本的強烈疑慮；但若東京繼續採取搭便車政策，則與美國同盟的維護則更加困難。

肆、東亞戰略環境轉變下的臺海危機

一、中共崛起對日本的安全威脅

1990 年代在東亞權力結構變化及重組的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崛起。1949 年之前，日「中」關係始終呈現一強一弱的格局（「中」強日弱或日強「中」弱）；但 2000 年之後，日「中」關係變成強與強的格局。³⁶世界第 2 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崛起，已深深影響日本戰略選擇：是否將繼續與美國維持或甚至加強同盟關係，或將「脫美入亞」，藉以

³⁵ 吳明上，〈美日建立海上聯合防衛的決定：以日本政治決定過程為中心〉，《東吳政治學報》（臺北），2004 年，第 20 期，頁 151-152。

³⁶ Jianwei Wang,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hina-Japan Relations," Yuki Tatsumi & Ben Self, eds.,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Security Issues in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Stimson, 2000), p. 71.

擺脫「被保護國」的角色，而增進與中共的關係。

2013 年中共軍事開銷將比 2012 年增加 10.7%，達到 1,143 億美元，維持 20 年來幾乎不間斷每年兩位數增長。³⁷2011 年到 2013 年，中共國防預算每年平均成長 11.8%；2008 年到 2012 年，中共武器出口總額，相較於前一個 5 年（2003 年到 2007 年）增長 162%，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 5 大武器出口國，也是僅次於印度的全球第 2 大武器進口國。³⁸柯慶生指出，即使中共未來在軍事或科技無法超越美國，而中共本身對此也有深切體認，但是美國仍無法嚇阻中共對其在東亞的軍事挑戰，因為美國兵力過度分散於全球，中共在東亞衝突有地緣上的優勢，以及美國有限的作戰決心（例如美國 1994 年退出聯合國索馬利亞人道援助行動），均可使中共升高與美國軍事衝突的機會。³⁹另外中國問題專家惠廷（Allen Whiting）研究中共在 1950 年至 1996 年間一共 8 次使用武力的個案後，得出中共行使武力時，奪取先制權的慣例，以支持其嚇阻及脅迫⁴⁰的外交政策。⁴¹

在未來有可能引發日本直接介入武裝衝突的引爆地點，首先是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因為地緣上，朝鮮半島任何動盪將直接對日本安全構成威脅。其次是臺灣海峽持續緊繃的軍事對峙及競賽。臺海局勢相當程度會直接對日方構成威脅，加上日本與中國大陸歷史上的傷痕與糾葛、在釣魚臺列嶼的領土爭端，以及中共在南海的領土野心，皆會對日本能源運輸及其所依賴的海上航線和相關海域，構成直接安全威脅。因此，

³⁷ 林寶慶，〈中國增軍費 白宮首度未促「透明化」〉，《世界日報》A5/綜合（二），2013 年 3 月 6 日。

³⁸ 劉永祥，〈陸武器出口 全球五強〉，《經濟日報》A11/大陸經濟，2013 年 3 月 19 日。

³⁹ Thomas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 7, 10, 17.

⁴⁰ 根據喬治（Alexander L. George）對脅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定義：脅迫外交乃是針對說服（persuade）或轉換（reverse）敵方的行動。參閱 Alexander L. George, "Coercive Diplomacy: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s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 7。

⁴¹ 參閱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195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2001), p. 104.

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安全困境

日本與美國在安全上直接的威脅無疑是來自北韓；而長期結構性的安全威脅可能還是來自中共。⁴²

中共在東亞與全球的崛起，以及與美國因臺海問題與中共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都密切牽動日本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而使日方被捲入美「中」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及同盟困境，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中，日本的角色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以下討論將有助於瞭解同盟困境中，日本的角色與戰略選擇。

二、美國的態度與反應

臺海飛彈危機發生時，美國官員向中共表示，對臺灣的飛彈試射是魯莽、具有侵略性，且可能被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同時美方亦有充分軍事能力來保衛其區域安全利益，而且也準備展示這種能力。⁴³但北京似乎無動於衷。有鑑於此，美國相繼派遣「獨立號」及「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趕赴臺灣海域，監視中共軍事行動。這一個航艦戰鬥群共有 30 幾艘軍艦、補給船、潛艦與艦載戰機，是越戰之後美國在東亞最大的軍事部署及集結行動，充分展現美國維護臺海現狀的決心。白宮認為，若不對中共軍事行動作出反應，美國在東亞繼續扮演積極角色的宣示與對東亞盟邦的安全承諾，將會被質疑。華府相信，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承諾有互賴的作用，因此要行使武力來回應對其東亞安全利益的挑戰，同時維持對區域盟邦忠誠的信譽。在理論層次上，⁴⁴謝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承諾相互依賴性」(interdependence of commitments)的觀念。⁴⁵因此如果美國在臺海問題上沒有表態或介入，不僅對東亞所有安全盟邦的安全承諾會被質疑，甚至美國與歐洲及全球所有的同盟關係也將陷入嚴重的信賴危機。

⁴² Christopher W. Hughes 著，李育慈譯，《日本安全議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7)，頁 202；薛瑞福，〈臺灣應注意美日同盟走向〉，《自由時報》，2007 年 1 月 29 日。

⁴³ Song Yann-huei, "China's Missile Tests in the Taiwan Strait.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aw Questions," *Marine Policy*, Vol. 23, No. 1, 1999, p. 109.

⁴⁴ Song Yann-huei, "China's Missile Tests in the Taiwan Strait.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aw Questions," p. 89 & 109.

⁴⁵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5-59.

三、日本的態度與反應

日本因應中共崛起時，面臨同盟的安全困境。日本可能陷入美「中」之拔河拉鋸，最明顯的即是臺灣問題引發的衝突，因為美國可能要求日本提供後勤支援，而中共可能侵犯臺灣周邊的日本領海，因此臺海衝突勢將波及日本。日本勢必向一方靠攏，以致捲入欲避免的衝突中。⁴⁶而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堪稱是兩大核武強權40年來最嚴重的軍事衝突與對峙。⁴⁷對日本來說，這也是冷戰後日本第一次面對美「中」衝突，而須做出關鍵戰略選擇的時刻。

日本在危機爆發初期，希望在美「中」兩國之間保持戰略平衡，一方面對中共表達關切；對美國的態度異常謹慎。在此情況，除了臺北與華府之外，沒有國家會面臨比日本更困難的抉擇。⁴⁸1996年3月6日，中共宣布飛彈試射的隔天，外務省電告時任北京駐日本大使鄭祥林，日本在飛彈試射中的「重大利益」，時任日相橋本龍太郎同時致電中共，表達請中共克制的訊息，同時向日本國會表示對此「嚴重關切」。而當時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對飛彈試射的後果提出警告，因為彈著地離日本沖繩縣與那國島僅6公里。同年4月，日本外相池田行彥與中共外長錢其琛會晤時表示，臺海周邊的和平環境對亞太穩定極為重要，並要求中共與臺灣進行直接對話，並用和平手段達成統一目的。⁴⁹

飛彈危機期間，橋本幾乎夜夜無法成眠。⁵⁰事件發生不久，橋本訓令日本政府執行4大危機處理方針：拯救日本僑民、處置大量難民、維護日本海域及對恐怖組織的應變，以及支持美國政府。⁵¹日方具體行動是在3月17日派出2艘補給船，分別支援「獨立號」航艦的糧食及油

⁴⁶ Christopher W. Hughes 著，李育慈譯，《日本安全議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頁112、202。

⁴⁷ Richard Bush & Michael O'Hanlon 著，《不一樣的戰爭》（臺北：博雅書屋，2010），頁13、23。

⁴⁸ Richard Bush & Michael O'Hanlon 著，《不一樣的戰爭》，頁181-182。

⁴⁹ Qingxin Ken Wang,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Pacific Review*, Vol. 73, No. 3 (2000), p. 364.

⁵⁰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396.

⁵¹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p. 387.

料補給。⁵²考量距離臺灣僅有 110 公里的與那國島有被侵略之虞，橋本向防衛廳下達機密指令，探討如何對美國實施支援。防衛廳展開秘密作業，提供 3 項援助，除上述油料補給外，尚包含航空自衛隊將提供美國雷達情報，陸上自衛隊將受傷美軍送往九州軍事駐地治療。⁵³

橋本同時不刺激中共當局，因為日方不想陷入在美「中」兩國之間選邊的困境。雖然日本對中國大陸的外交作為往往小心謹慎，態度頗低，但如此小心翼翼，乃是中共對日本的威脅一直高於美國。⁵⁴因此東京對美國派遣航艦戰鬥群到臺海周邊並無公開背書。外務省也表示，因為日本無法移動其列島，因此與中共及臺灣必須保持良好關係。在此緊張情況之下，日本比美國相對脆弱，因此不能將自己置於險境之中。⁵⁵時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在 1999 年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對「中」方提出警訊，在對臺灣的問題上要特別克制，否則將引起日本的再軍備。傅立民指出：⁵⁶

「如果我們（美方）不干預（臺海問題），許多日方人士就會認為美方沒有履行防衛日本周邊的同盟義務，因此會有許多壓力加諸日本政府，要求增加軍備與能力，以自身的力量維護本國安全。若我們決定干預，那就要使用美軍駐日基地。這將意味日本要在維持與中國大陸良好關係或是繼續與美國成為盟邦之間做一抉擇。我想，日本會選擇美國。但我也認為，沒有任何日本政府會希望被一個外國人逼到如此的困境。正因如此，日本政府會承受許多壓力，增強本身獨立的軍事能力，以避免被外國人逼迫走到這個困境。」

⁵²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p. 398.

⁵³ 張隆義，〈從安保觀點看冷戰後日本對中共的政策〉，《問題與研究》（臺北），第 38 卷，第 1 期（1999），頁 7；楊志恆，〈由日本角度看《臺灣關係法》：日中關係與日美安保的視野〉，林碧炤、林正義主編，《美中臺關係總體檢：「臺灣關係法」30 年》（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9），頁 289。

⁵⁴ 金泰虎，〈韓國對於兩岸關係與日本因素的看法〉，《臺灣有沒有明天？臺海危機美中臺關係解密》，頁 348。

⁵⁵ Qingxin Ken Wang,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pp. 364-365.

⁵⁶ Funabashi Yoichi, *Alliance Adrift*, pp. 396-397, 427.

如果傅立民的分析正確，日本在美「中」之間選擇美國，那日本就陷入了同盟安全困境，畢竟相較下，臺灣在日本整體安全政策的考量上，不如朝鮮半島急迫與重要。因為北韓近年來一連串冒險舉動，再加上地緣戰略的考量，使日本不得不加強和美國的同盟關係。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在 1996 年接受《產經新聞》專訪時指出，臺海爭端在一些日本官員看來只是中國大陸的內戰，美國支持也只是基於人道立場。⁵⁷其實 1996 年擴大美日同盟合作關係的共同宣言，原本並非針對中共，主要是針對朝鮮半島。但無庸置疑，隨著 1995 年 11 月至 1996 年 4 月中共對臺灣軍事壓迫行動的增強，對安保體制的再強化，起了關鍵作用。美日兩國技巧性的利用臺海危機爭取國內民眾對安保體制強化的支持。⁵⁸雖然亞洲同時存在數個多邊安全機制，但是日本仍是以雙邊同盟關係為主，多邊安全機制為輔。⁵⁹日本針對 1990 年代以來，東亞安全局勢的大幅轉變，尤其是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其因應對策則是增強及擴大美日軍事同盟體制。

四、安保體制下日本軍事介入臺海機會增加

楊志恆分析，日本對臺海衝突雖然不太可能單獨介入，但更不可能完全不理會美軍介入。日本可能採取 3 種措施：（一）消極呼應美國軍事行動，但與美國共同呼籲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二）說服美國不要軍事介入，兩國積極尋求外交管道阻止臺海衝突惡化；（三）積極配合美國軍事行動，同時透過外交管道，共同化解危機。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前，日本可能採取第 1 種選項；但 1997 年或 1998 年後，日本可能採取第 3 種選項。採取此一選項的唯一途徑，是日美安保體制。⁶⁰

趙建民與何思慎亦認為，臺海一旦爆發衝突，日本可能依據《美日

⁵⁷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p. 396.

⁵⁸ Paul S. Giarra and Akihisa Nagashima, "Managing the New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Enhancing Structures and Mechanisms to Address Post-Cold War Requirements," in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102;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p. 425.

⁵⁹ Peter Katzenstein and Okawara Nobuno, "Japan,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p. 166.

⁶⁰ 楊志恆，〈由日本角度看《臺灣關係法》：日中關係與日美安保的視野〉，《美中臺關係總體檢：「臺灣關係法」30 年》（臺北），頁 303。

安保條約》與《美日合作防衛指針》，派遣自衛隊支援美國軍事行動。⁶¹日本基於地緣戰略考慮，是最可能與美國合作因應臺海危機的對象。⁶²因為如果美國軍事介入臺海紛爭，而日本拒絕提供美國協助，則美日安保體系將無法運作。⁶³再者，日本因為沒有類似《臺灣關係法》的對臺安全機制，因此只能藉助美日同盟關係，維護日本在臺海議題的相關利益。⁶⁴王清欣（音譯：Qingxin Ken Wang）也認為，東京的後勤支援對美國在臺海軍事行動的成功執行非常關鍵。日本若無法履行後勤支援，將會嚴重影響美日關係，可能導致美日安保體制解體。⁶⁵

卜睿哲（Richard Bush）與歐漢倫（Michael O'Hanlon）認為，萬一美「中」因臺海衝突開戰，日本是最重要的國家，雖然日本幾乎不可能想與中共交戰，但是美日有堅定同盟關係，日本至少會提供美國使用那霸機場。而中共可能藉由威脅甚至攻擊那霸機場，以說服日本重新思考戰爭的角色。但中共可能錯估形勢，由於日本關心中共崛起與民族主義高漲，日本比較可能的反應是，重申對美國的支持，甚至自己投入戰爭。如果日本參戰，其實質幫助非常關鍵，尤其是日本海軍保護太平洋海路的能力及廣泛的潛艇作戰、飛彈防禦及空中防禦能力。⁶⁶

歷經 1996 年臺海危機與 2012 年起激化的日「中」釣魚臺爭議，使美日雙方認識到重新定義與加強同盟合作的重要性。最新 2013 年美日「2+2」會議的結論中，對此趨勢表露無疑。

⁶¹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臺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臺北），第 43 卷，第 1 期（2004），頁 97。

⁶² 林正義，〈「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臺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季刊》（臺北），第 8 卷，第 1 期（2007），頁 20。

⁶³ 張隆義，〈從安保觀點看冷戰後日本對中共的政策〉，頁 9。

⁶⁴ 楊志恆，〈由日本角度看《臺灣關係法》：日中關係與日美安保的視野〉，《美中臺關係總體檢：「臺灣關係法」30 年》（臺北），頁 289。

⁶⁵ Qingxin Ken Wang,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p. 367.

⁶⁶ Richard Bush & Michael O'Hanlon 著，《不一樣的戰爭》，頁 181-182。

伍、新美日安保體制的強化

冷戰後日本政府在美日安保體制下，做出責任分攤與加強同盟關係的具體政策與作為。在 1990 年代，美日透過 1997 年防衛指針的制訂、戰區飛彈防衛體系的建構，以及「恐怖主義對策關連三法」（《反恐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的通過，強化安保體制。1999 年日本國會通過有關新防衛指針的 3 項法律，簡稱《周邊事態法》。依此，日本自衛隊可以扮演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積極的角色。⁶⁷此 3 項法律分別為《自衛隊修正法》、《日本相互提供物品及勞務修訂法》及《周邊事態時確保日本和平安全法》。這 3 項法案不但落實 1997 防衛指針中「周邊事態」的制度化工作，而同時也將日本防衛政策從過去「消極防衛」政策轉變為「積極防衛」政策。⁶⁸此一同盟關係的深化與壯大，將影響日本同盟困境的角色與此同盟與敵對勢力的戰略互動。

2013 年 10 月 3 日，美日兩國外交、國防部長級「2+2」會議，又稱「美日安全諮商會議」（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通過聯合聲明，其中決定修正 1997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明顯針對中共在亞太區域日漸強大的軍事野心。這次美日雙方同意於 2014 年底前完成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最大理由則是因中共軍事抬頭，不斷在釣魚臺海域製造軍事緊張。⁶⁹這是 1997 年以來，「2+2」會議首次移師日本舉行。⁷⁰

2013 年美日「2+2」會議中，美日不但點名中共軍事威脅，在聯合聲明中更明示歡迎安倍內閣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求。美方在 2013 年

⁶⁷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Intensivere Kooperation mit Amerika-Japan verabschiedet Gesetze zur militärischen Zusammenarbeit,”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1999/05/25; “Japan Expands Its Role As U.S. Military Partn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99/05/05.

⁶⁸ 蔡增家，〈從新保守主義論述變遷中的日本防衛政策〉，《遠景季刊》（臺北），第 8 卷，第 3 期，頁 107。

⁶⁹ 張茂森，〈美日修正防衛指針 劍指中國〉，《自由時報》（臺北）A12/國際新聞，2013 年 10 月 7 日。

⁷⁰ 雷光涵，〈美日防衛聲明 點名北韓暗指陸〉，《聯合報》（臺北）A24/國際，2013 年 10 月 4 日。

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安全困境

「2+2」會議及此前一再強調，釣魚臺問題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 5 條，顯示美國捍衛日本對釣魚臺管理權的決心。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則是美國推進對抗中共霸權的布局，「顯然有圍堵中共的意涵」。⁷¹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 2013「2+2」會議中，確認將構築力量更大的美日同盟，「日本從『積極的和平主義』出發，與美國為首的關係國合作，做出比過去更積極的貢獻，維持國際社會的和平」。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重申美國對釣魚臺列嶼主權不採取立場，但「希望『當事者』勿單方面挑釁，盼以外交及合法方式來處理。」⁷²而「與美國為首的關係國」，其中應包含臺灣。

上述日本防衛政策與美日安保體制發展的趨勢，說明冷戰之後日本政府在美日安保體制下，做出責任分攤與加強同盟關係的具體政策與作為。而其中主要原因除了北韓持續的核武與飛彈威脅之外，中共仍是日本安全的長期重大隱憂。將以上所討論的事實與同盟困境理論加以對照，得出此一結果將使日本陷入同盟中被捲入的困境。同時也意味日本認為對安保同盟體系維繫的價值，大於為盟邦（美國）利益作戰的成本，而如此對美國的依賴也勢將弱化日本對美國談判的立場。以下將討論日本此一同盟政策的選擇對中共的影響，及此一同盟困境與敵對困境的交互影響。

陸、美日同盟困境與對中共敵對困境的交叉影響

一、日本遭受美國背棄機率低

上文提到，同盟困境與敵對困境有交互影響的關係。責任分擔戰略會壯大同盟力量，依照權力均衡理論，將會很快形成一個反同盟。反之，若採取搭便車戰略，則可以降低反同盟形成的危險，而進一步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將這理論應用到本文實際例子。日本政府在中共崛起因素影

⁷¹ 張茂森，〈美日修正防衛指針 劍指中國〉，《自由時報》（臺北）A12/國際新聞，2013 年 10 月 7 日。

⁷² 雷光涵，〈美日防衛聲明 點名北韓暗指陸〉，《聯合報》（臺北）A24/國際，2013 年 10 月 4 日。

響下，如果選擇搭便車，固然會使美日同盟關係陷入緊張，或最嚴重的後果，但日本將會被美國背棄；但另一方面，卻可大幅解除來自中共的疑慮，增加與中共合作的機會。倘若日本選擇責任分擔，固然可以鞏固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但要冒著被美國捲入危機的危險，在敵對賽局中，則可能引發中共反彈，加深與中共衝突的可能性。

依據前述，施奈德對「背棄」形式的界定，包含：⁷³同盟可以轉而與敵方結盟、解除同盟條約、不履行條約規定的承諾、或是在同盟出現緊急狀態時，拒絕提供協助。後兩者情況，同盟雖然形式上仍存在，但已名存實亡。觀察二次大戰後迄今，美日外交與安全關係的發展，若依照施奈德的定義，誠難得出日本有被美國背棄的危險存在。如果日本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遭受背棄，意味日本勢必將獨立負擔起國家安全與防衛的任務，屆時若大幅擴張軍備、發展與部署戰略性武器或廢除憲法第 9 條的非戰條款，這些都是合理的想定，同時將使亞太地區的情事更為緊張。正因如此，在可見的未來，日本遭美國背棄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姑且不論美國與前蘇聯及中共，在許多核心價值與意識形態的歧異，但與日本是價值同盟關係，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日本是美國在亞太戰略布局上，作為牽制或對抗中共與前蘇聯的重要盟邦；對全球戰略布局而言，美日兩國可藉由同盟關係將觸角由西太平洋深入印度洋，並伸展到中東波斯灣地區。

二、日本選擇責任分攤政策與其後果

基於前文分析，日本防衛政策與美日安保體制發展的趨勢，說明日本政府在美日安保體制下，做出責任分攤與加強同盟關係的具體政策與作為。事實上，中共在 1996 年美國時任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與時任日相橋本發表美日同盟共同宣言後，對美日安保體制產生極大疑慮，尤其是發表日期剛好是臺海飛彈危機後的一個月。而 1997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制訂擴大自衛隊的角色又有雪上加霜的作用。讓北京最無法忍受的是，「指針」中「周邊有事」的規定與美日戰區飛彈防

⁷³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07), pp. 466-467.

禦計畫，因為這表示加強美方對臺海衝突介入的能力。⁷⁴而中共當局面對美日同盟自 2005 年將臺海列入共同戰略目標，表達堅定反對的立場，中共堅決反對美日發表任何涉臺共同文件，干涉中國大陸內政，損害中國大陸主權。北京認為，日本政府緊緊追隨美國，對抗中國大陸，只會讓日本走上危險的道路。⁷⁵美日兩國將臺海列為美日區域的戰略目標，將提供日本介入臺海衝突的「法律依據」。⁷⁶

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角度剖析，美日安保體制的擴大，使得冷戰後逐漸崛起強大的中共陷入一個不利的戰略地位，事實上則是對中共做某種程度的圍堵，或至少是一個避險的戰略作為。日本也因此陷入安全困境：對美國提供過少的軍事協助，同盟關係將受危及，日方的國防安全不能獲得充分保障；過多的軍事協助則造成鄰國對其重整軍備的憂慮。在此一情況之下，美日安保體制的擴大及強化，使日本陷於敵對的安全困境。

日本雖知選擇責任分攤的後果，固然使美日同盟更加穩固，但是也冒著與強鄰中共衝突的風險。休斯（Christopher W. Hughes）認為日本依賴同盟關係為其安全的保障，並對中共崛起感到憂心，因此意味著必須拉攏美國，避免遭美國遺棄而陷入同盟安全困境。⁷⁷因此 1990 年代以來，日本不得不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同時避免疏遠中國大陸。雖然日本並非完全無條件地支持美國，也提防被美國捲入區域或全球衝突，但是美日軍方更加密切整合卻是主要的趨勢。王清欣指出，臺海一旦發生武裝衝突，如果日本想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即使百般不願也極有可能引發與中共的軍事衝突，日本仍可能提供美國軍事介入行動所必須的後勤支援。⁷⁸在 2013 年美日「2+2」會議中，美國支持日本行使集體

⁷⁴ Thomas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pp. 61-66.

⁷⁵ 〈臺海問題竟成美日共同戰略目標 我堅決反對〉，《新華網》，2005 年 2 月 2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20/content_2596048.htm〉，（瀏覽日期：2009 年 1 月 12 日）。

⁷⁶ 〈日美共同戰略目標瞄準臺灣海峽 日本直接表態〉，《新華網》，2005 年 2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19/content_2593132.htm〉，（瀏覽日期：2009 年 1 月 12 日）。

⁷⁷ Christopher W. Hughes 著，《日本安全議題》，頁 202-203、287-288。

⁷⁸ Qingxin Ken Wang,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自衛權的立場，更加強日本以軍事戰鬥行動，支援美軍的可能性。日本此一做法顯示，在無法兼顧與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時，日本意識到在長期，美國對其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價值遠勝於中共之於日本。

在此意義下，日本考慮的重點將是，維持美日同盟關係所得到的利益最終將大於和中共衝突所付出的代價，或是維繫同盟的價值高於為美國對中共作戰的成本。因此在同盟困境理論架構下，吾人可以合理推論，日本即使冒著被捲入與中共衝突的風險，維持並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仍是日本安全與防衛政策的首要目標。

柒、結論

本文以軍事同盟中的安全困境，提供分析冷戰後美日安保體制變遷的一個面向。此一理論縱使無法顧及此一課題的所有面向（事實上，沒有任何單一理論有此能力），但或許能夠解釋其中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同盟困境出現在某個盟邦想維護自身安全，同時又想避免被另一個盟邦捲入與自身安全利益不太相關或完全無關的衝突中。在這種情況之下，該盟邦通常會採取搭便車的策略。但這種策略通常伴隨被另一同盟夥伴背棄的危險。如此一來盟邦即喪失了集體防衛的意義。而在另外一種想避免被盟邦拋棄而履行責任分擔義務時，則又會有被捲入衝突的危險。

本文試圖以國際政治理論中軍事同盟的安全困境，藉由美日安保體制與 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為例子，來解釋與日本可能被捲入臺海危機的風險。在後冷戰時代，亞太戰略環境大幅轉變的同時，中共與美國都企圖展現以軍事武力保護其亞太安全利益的企圖心。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而美國也要維持其在區域對盟邦的安全承諾及威信。冷戰後美日安保體制的擴大及強化，日本充分顯示出放棄冷戰時期搭便車的戰略，而轉向對其唯一盟邦美國做出責任分攤的跡象，以維護美日安保體制穩定與壯大，同時也維繫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及穩定。

因此，日本在今後美國在亞太地區所可能面對的軍事衝突當中，例

the Cold War,” p. 353, 372.

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安全困境

如美「中」在臺海的爭端，可能無法因為要保持與中共的良好關係，而完全置身事外，造成與美國安保體制的瓦解；所以日本極可能被捲入此一衝突，而陷入同盟中的安全困境。再進一步分析，美日安保體系的擴大與增強，也可能引起一股對抗的力量或同盟出現。日本在這種情況之下，同時陷入了同盟內的安全困境及同盟外的敵對困境。

鑒於中共在亞太勢力的擴張、朝鮮半島及東海釣魚臺列嶼持續緊張的局勢，日本重新回到冷戰時期搭便車路線的可能性極微。回歸此一路線固然能減低被捲入衝突的危險，而且能拖延抗衡勢力的集結，但日本要付出的代價是美日安保體制的鬆散甚至瓦解。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規定與國內和平反戰的社會對其軍備的重整將構成巨大障礙，但缺乏美國軍事協助，日本勢必要單獨負起國防安全的責任，極端情況之下，核子武器及飛彈的發展及建造可能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亞洲各國也會針對日本在此情況下軍事的擴張，做出相對的反應，進而引發亞太各國全面的軍事競賽，這也是日本及周邊各國所不樂見的。

總而言之，按照同盟困境的理論，若美日安保體系一天存在，而區域內衝突無法和平解決，亞洲各強權又無法調和建構其相互間穩定及互信的關係，日本將很難擺脫同盟中被捲入的困境。

Japan's Dilemma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Risk of Entrapment

Tai-ho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since the 1990s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on of alliance dilemma in th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lemma in an alliance: entrapment and abandonment. When one party in the alliance chooses a burden-sharing policy to maintain the alliance, it risks the danger of entrapment. On the other hand, when it chooses a free-rider policy to avoid entrapment, it risks the danger of being abandoned by its ally. Such a situation is the so-called alliance dilemma, and it has a correlation with the adversary to the alliance. When the party risks entrapment because of sharing burdens, it will result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an adversary power against the allianc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party risks abandonment because of free riding, it may instead dispel the concerns of the adversary power and gain the chance to cooperate with the adversa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Japan has been moving toward burden sharing for its part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As a result, the risk for it to be entrapped has been increa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will also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U.S.,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Japan. The 1996 Taiwan Strait missile crisis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n expl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Japan being entrapped in a cross-Strait conflict if the U.S. chooses to interven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will in the meantime incur the response of the rising Mainland China, which in turn may worsen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U.S.-Japan security system; military alliance; alliance dilemma, Taiwan Strait missile crisis

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安全困境